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 71 期 2024 年 6 月,頁 119-160 DOI:10.6243/BHR.202406 (71).0003

# 跨境的歷史認識 ——冷戰時期佐藤慎一郎的 「中共觀察」與香港行\*

## 林志宏\*\*

## 摘要

本文以佐藤慎一郎為個案,探討日本在冷戰時期的「中共觀察」。佐藤的經歷相當特別。戰爭結束前他具有「中國經驗」,擔任過滿洲國民政部文書科屬官、大同學院教官,後來成為總務廳等事官,敗戰後於1947年歸返日本。1959年,佐藤在拓殖大學任教,開始一連串地「中共觀察」。這位昔日的「支那通」貫穿戰前與戰後,成為「中國問題研究家」,也是日本有關「反共」言論的代表。1967年的香港左派騷動結束,他以拓大教授名義,連續三年前往香港訪問中國內地逃脫的難民;此外,當「日中邦交正常化」時,還公然抨擊日本田中內閣的親共外交。出版多本有關分析中共農業集體化及人民公社著作的佐藤,甚至主張中國的文化正統在臺

<sup>\*</sup>本文係中央研究院前瞻計畫「帝國進程及其延續:冷戰時期的大同學院同窗會」 (AS-CDA-109-H01)之部分成果。初稿宣讀於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日本一般 財團法人霞山會主辦的「東亞近現代史中的變遷、對抗、融合——歷史、教育、產 業、經濟的視角」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臺北大學歷史學系,2022年11月4-5 日),感謝與談人徐浤馨教授的意見,以及拓殖大學長谷部茂教授餽贈佐藤慎一 即相關資料。其後復經三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之修改建議,使本文更臻完善, 謹致謝忱。惟文責仍應由筆者自負。

<sup>\*\*</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臺北大學歷史系合聘副教授

灣。要理解冷戰時期佐藤慎一郎的言論,吾人似乎無法迴避其思想延續性,包括他戰前對華有關農村破產與再建的思考。因此,藉由佐藤之例,本文希望增添文化冷戰的一頁新史。

關鍵詞:香港、日本、戰後中日關係、文化冷戰、佐藤慎一郎

## 一、前言

1985年3月10日至4月6日,歷史學者周一良(1913-2001)應東京大學之邀,前往日本訪問四週。他以「溫故而知新」來形容這趟旅行;除了會見久違的老友外,也藉由學術交流機會,體察戰後日本社會的各項發展,期間「又認識了不少新朋友」。值得注意的是,周氏遇見某位名叫「佐藤慎一郎」的日本人,且有如此描述:

他的舅父山田良政,是支持孫中山先生而在惠州犧牲的。他全家都與孫中山以及其他當時的革命者相熟悉,給我看了廖仲凱【愷】先生給他父親寫的對聯。雖然這位人道主義者的老人與我們立場觀點全不相同,但他所追敘的舊事和對我們的針砭,還是值得傾聽的。1

簡短數語道出對這位初識日本人的感受,還有刻畫其「諍友」形象。但周氏的文字並沒有繼續發揮當中深意,吾人僅得知佐藤顯 赫的家世背景,卻無從獲悉其確切來歷。

實際上,佐藤慎一郎(1905-1999)無論在戰前、戰後皆有極不平凡的人生。戰前他憑藉著家學淵源,開啟中國之行,參與日本殖民滿洲的工作;而戰後佐藤在日本的知識界更形活躍,時人屢以「中國問題研究家」目之。正因為過去對華的觀察和經驗,佐藤被延攬至拓殖大學(簡稱「拓大」)從事教研工作,且每每對中共政權施以針砭,寫下有關人民公社、農業集體化政策等評議文字。當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1918-1993)出訪中華人民共和國、舉國普遍頌揚「外交正常化」之際,他卻發出不平之鳴,屢與政府意見相左而備受矚目。直迨廿一世紀伊始,還有人以「危機」為喻,檢視1970年代日本的「邦交正常化」政策,佐藤更成為被提及的人物。

<sup>1</sup> 周一良,〈扶桑四周〉,收入周一良,《周一良集 第4卷:日本史與中外文化交流 史》(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419。

迄今為止,要找到像佐藤慎一郎這樣的個案來分析恐不算多。<sup>2</sup>筆者之所以選擇佐藤進行討論,主要原因是他個人的事功並非在政治或技術官僚領域,充其量來說不過為一位中層的日本知識分子而已;而佐藤所遺留的言論和文字,雖有學術的客觀成分存在,卻又不乏其主觀性格。換言之,其中有來自客觀上相關的中國經驗,又有戰後國際冷戰(Cold War)局勢下主觀的現實關懷,這些條件讓他得以進行研究,並在此基礎上成為近代日本相關領域的重要學者。可以這麼說,佐藤一生與廿世紀的日本命運幾乎相始終,所注意和思考的問題都攸關日本對中國外交之變遷。因此釐清佐藤個人在不同階段的想法,將有助於觀察日本在帝國與後帝國時期的發展;而他個人對中共之議論,亦為戰後日本知識界左翼之外的另一種聲音。

本文另一切入點是觀察冷戰初期日本和東亞的關係。維持約 近五十年的國際冷戰局勢,雖在1990年代初結束,卻仍為史學界 關注的焦點。最近廿年間,相關研究仍繼續發展壯大,不僅超越 地緣政治的視角,甚至還突破到文化層面上。<sup>3</sup>然而,對日本有關

<sup>2</sup> 就筆者所知,遊走於戰前和戰後期間、對中國有一定程度瞭解者,多半跟東亞同文書院及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的學經歷相關,此外則是新聞記者。據嚴紹盪《日本的中國學家》所收學者專家共1,105人,尚不包括廣義的「支那通」。然而,這些人雖對中國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卻少有政黨淵源。有關這方面分析,可參見:安藤彦太郎,〈戰時期日本の中国研究〉,收入小島晋治、大里浩秋、並木頼寿編,《20世紀の中国研究:その遺産をどう生かすか》(東京:研文出版,2001),頁156-173;萩野脩二,〈「支那通」について〉,《中国研究月報》,554(東京,1994.4),頁32-40。譬如,與佐藤慎一郎有著類似經歷的山內一男(1915-2008),1940年參加過滿鐵調查部,曾任建國大學教授,1957年返回日本,後任法政大學經濟部教授,發表過多篇有關中國社會主義和經濟問題,卻未有中國政黨的關係。山內經歷參見:中西利八編,《第四版滿洲紳士錄》(東京:滿蒙資料協會,1943),頁310;嚴紹盪,《日本的中國學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頁364。

<sup>&</sup>lt;sup>3</sup> 冷戰除了涉及美、蘇兩國陣營對政治、社會、經濟等層面爭鬥外,還涵蓋到「審美」的區域,像是有關現代主義的藝術、音樂、文學等製作,並包含消費和評判的不同理念之鬥爭,此即所謂「文化冷戰」(Cultural Cold War)內涵。關於這些研究轉向,參見: Michael F. Hopkins, "Continuing Debate and New Approaches in Cold War Histo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50: 4 (December, 2007), pp. 929-933; Gordon Johnston, "Revisiting the cultural Cold War," *Social History*, 35: 3 (August,

的討論還是停留在美國占領及其改革轉型上。誠如Gavan McCormack 所言:美國於日本的影響非惟如是,更利用後者成為對抗共產勢力的基地,彷彿就像「遠東的英國」般,進而造就了亞洲的冷戰格局。4可惜的是,如此深富洞察力的討論並未凸顯日本之自主性,看不到日本官方和民間的反響。此處以佐藤慎一郎為例,描繪其心態之複雜面向,將他放在冷戰的國際環境和東亞來看,特別是日本方面的相關言論。筆者認為:佐藤的「中共觀察」係以學術為包裝,透過理解社會主義文化及其日常生活印證中共施政的不適切性,未必符合中國需要。他的「客觀研究」服務於單一向度的解讀——亦即自由民主戰勝極權。通過本文分析,增添文化冷戰的一頁新史。

## 二、成為「支那通」的佐藤慎一郎

誠如周一良言,出身於日本青森縣弘前市的佐藤慎一郎,其家世與近代中國的黨政淵源甚深。他的舅父山田良政(1868-1900),嘗追隨孫中山(1866-1925)之革命事業,後在惠州起事失敗後被清軍逮捕和殺害,<sup>5</sup>成為目前臺北國民革命忠烈祠內少數祭祀的外國人,甚至是唯一一位日本國籍的「革命先烈」。另外,佐藤另一位舅父山田純三郎(1876-1960,良政弟)則係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的學生,也和中國國民黨的關係匪淺。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敗

2010), pp. 290-307. 文化冷戰自Robert Haddow和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開啟討論以來,蔚為風潮。簡單地說,經由「官方文化」為出口,無論或顯或隱的方式,透過交流計畫、國際節慶、學術研討會、貿易展覽、交響樂和芭蕾舞巡迴表演,以及博覽會的展示等,無疑都是利用「文化」進行外交和宣傳的典型例證。參見:Robert Haddow, Pavilions of Plenty: Exhibiting American Culture Abroad in the 1950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7);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London: Granta Books, 1999).

Gavan McCormack, Client State: Japan in the American Embra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7).

<sup>5</sup> 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傳》(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4),下卷,頁 454;中村義等編,《近代日中関係史人名辞典》(東京:東京堂出版,2010), 頁593。

後,純三郎取代宮崎滔天 (1871-1922) 地位,成為孫中山與日本朝野之間聯繫的管道。等到孫氏逝世後,純三郎則寓居上海長達數十年之久,畢生不僅致力於中日兩國間的交流,且與國民政府的要人經常往來。<sup>6</sup>

#### (一)滿洲國民政部時期的佐藤慎一郎

由於家世背景,佐藤慎一郎很早即對中國的情況有所認識,青年時期更懷抱至東亞大陸發展的夢想。1924年3月底,他追隨已逝舅父良政的腳步,先於青森縣師範學校畢業,接著隔年赴往滿洲工作。佐藤最初是在關東州公學堂和水師營公學堂服務,未幾進入旅順師範學堂的附屬教員養成部研究科學習。1928年7月,佐藤進入關東州內大連土佐町公學堂(中國人小學校)教書,並以此為契機,嘗試和中國的漢族社會相處及生活。<sup>7</sup>直迨「九·一八」事變前後,佐藤慎一郎接連幾次通過關東廳舉辦的中文獎勵測驗,從事與體育相關的教學。像是1932年11月,他針對如何推廣小學的體操表達意見,撰有討論文字。<sup>8</sup>

傀儡政權滿洲國之成立,令當時日本社會各階層擁有「滿洲 熱」的民眾燃起希望,<sup>9</sup>佐藤慎一郎便係其中顯例。他投入滿洲國

<sup>6</sup> 山田純三郎, 〈50年の大陸生活〉, 《世界の動き》, 4:3(東京, 1949.2), 頁 6-7。相關討論另參見:栗田尚弥,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日中を架けんとした男たち》(東京:新人物往来社,1993), 頁96-119; 武井義和, 〈孫文支援者であった山田純三郎の戦前から戦後における日中関係観とアジア観―孫文死後の山田の主な発言と行動を手掛かりとして―〉, 《同文書院記念報》,27(豊橋,2019.3), 頁17-32; 佃隆一郎, 〈山田純三郎と「中国新軍閥混戦」―孫文死後数年間の山田の軌跡―〉, 《オープン・リサーチ・センター年報》,3(豊橋,2009.3),頁367-377。

<sup>7</sup> 佐藤慎一郎,〈日中交流私考〉,《海外事情》,27:4(東京,1979.4),頁47;不著撰人,〈佐藤慎一郎先生関係年譜(未定稿)〉,收入長塩守旦監修,《日中提携してアジアを興す 第2集 我が生涯は水の如くに》(東京:志学会,2001),頁9。

<sup>6</sup> 佐藤慎一郎,〈體育講習〉,《南滿教育》,121(旅順,1932.11),頁45。

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Sandra Wilson, The Manchurian Crisis and Japanese Society, 1931-3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123-216.

的公部門機關工作,參加各項行政事務,例如1932年12月至1938年12月期間擔任民政部文書科屬官。<sup>10</sup>惟不同者,身兼滿洲新政權公職的佐藤,未必全以殖民者立場看待中日問題;相反地,有許多態度則顯露對華表示同情。一項最鮮明例證,係佐藤關切「一二·九」抗日示威運動的發展。早自1934年7月起,他奉滿洲國政府命令前往北京,考察華北情勢。當時日本正向中國侵逼,先是爆發長城戰役,接著占領熱河,兩國關係瀕臨緊張關頭。南京國民政府對此卻採取一味退讓的原則,僅以訂立《塘沽協定》暫息爭端,結果激發國內諸多人士不滿。1935年12月9日,北京地區的大學、中學生即在共黨暗中策動之下,上街進行請願和遊行,要求政府「停止攘外必先安內,一致對外抗日」。佐藤慎一郎便以個人身分參加抗議行動,據其晚年憶述是贊同學生愛國的表現。<sup>11</sup>

擔任滿洲國公職期間,佐藤慎一郎因工作關係漸成為「支那通」——即廣義上對中國事務具有相當瞭解的日本人。之所以有此機緣,係因他經常處理翻譯事務。譬如1936年10月,佐藤曾擔任吉林省長李銘等人到東京見學的通譯;甚至中日戰爭爆發以前,他也接待過日人,協助引導視察。<sup>12</sup>正因深諳於語言優勢,佐藤還負責翻譯《察綏蒙民經濟的解剖》一書,儘管自承是公務餘暇期間匆匆完成,惟其能力普受肯定,殆無疑義。<sup>13</sup>

<sup>10</sup> 舉國社編,《大滿洲帝國名鑑》(出版地不詳:編者印行,1934),頁17。

<sup>11</sup> 佐藤慎一郎,〈日中交流私考〉,頁48;佐藤慎一郎,《汨羅の淵に佇んで中国の 激動史を見る―中華人民共和国誕生の陣痛―》(堺市:大湊書房,1985),頁24-25。

<sup>12 〈</sup>第4682号 11·10·5「満洲国吉林省長一行見学の件」(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昭和11年10月(1936.10),收入《海軍省公文備考》(東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檔號:C05034820900;曲乗善,〈七七事變前隨清水良策赴中國內地「視察」〉,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日偽政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頁86。

<sup>13</sup> 是書列為內政研究會邊政叢書的第二冊,參見:賀揚靈,《察綏蒙民經濟的解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佐藤的說法引自:賀揚靈著,佐藤慎一郎譯,〈察哈爾·綏遠蒙民經濟の解剖(其の九)〉,〈察哈爾·綏遠蒙民經濟の解剖(其の九)〉,《内務資料月報》,2:10(新京,1938.10),頁44。

更重要的是,針對都市化帶來農村破產的社會現象,佐藤慎一郎駐留華北期間還考察過山東省鄉村建設(簡稱「鄉建」)之成效,並寫有多篇文章。1935年12月,他以滿洲國民政部總務司屬官的名義前往山東省鄒平縣,考察鄉建研究院,並與梁漱溟(1893-1988)聚談。<sup>14</sup>之後,又將蒐羅而來的鄒平縣實驗規程、山東縣政建設實驗區等資料加以翻譯,陸續公布出來。<sup>15</sup>此外,還對中國農村的豪紳、官僚與胥吏如何剝削百姓的情況,進行觀察研究,歸納其中性質。<sup>16</sup>他的終極關懷非純為中國社會而發,更有替滿洲的殖民治理獻策。佐藤認為:儘管日本以武力支配滿洲國,但社會上大部分均係漢族;民族既然不同,且文化內容也互異,要使大和民族有其「指導」的正當性,則需參酌農村現況而調整,以為施政方針。至於殖民當局正在研擬的「街村制」,他深感當中的「官治」色彩太過濃厚,有必要參考中國的鄉建運動。<sup>17</sup>(二)參與培訓官僚和調查漢族社會

結束民政部工作不久,佐藤慎一郎便受殖民當局重用,參加 大同學院講學,又兼任總務廳調查官、官房參事官等職,還有擔 任建國大學研究院的研究員。<sup>18</sup>大同學院原係滿洲國專門訓練高等

位藤慎一郎,〈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概況〉,《民政部調查月報》,1:7(新京,1936.7),頁83-98;不著撰人,〈佐藤慎一郎先生関係年譜(未定稿)〉,頁10。

<sup>15</sup> 佐藤慎一郎,〈山東鄒平實驗縣實驗規程集〉,《内務資料月報》,1:1(新京,1937.7),頁31-38;佐藤慎一郎,〈山東鄒平實驗縣實驗規程集(二)〉,《内務資料月報》,1:2(新京,1937.8),頁61-81;佐藤慎一郎,〈山東鄒平實驗縣實驗規程集(三)〉,《内務資料月報》,1:3(新京,1937.9),頁46-66;佐藤慎一郎,〈支那に於ける縣政建設實驗區設立關係規程〉,《民政部調查月報》,1:8(新京,1936.8),頁101-114。

<sup>&</sup>lt;sup>16</sup> 佐藤慎一郎,〈支那農村に於ける經濟的剝奪關係〉,《民政部調查月報》,2:1 (新京,1937.1),頁1-22。

<sup>17</sup> 佐藤慎一郎,〈定縣に於ける縣政建設運動(前)〉,《民政部調查月報》,2:3 (新京,1937.3),頁48。所謂「街村制」係於1937年12月公布,為滿洲國地方行 政制度之確立。當時民政部委託佐藤慎一郎、蛸井元義、山崎健太郎、井上實等 四位進行考察。奥村弘,〈「満州国」街村制に関する基礎的考察〉,《人文学 報》,66(京都,1990.3),頁15-39。

此時佐藤履歷可參見:不著撰人,〈佐藤慎一郎先生関係年譜(未定稿)〉,頁 10;中西利八編,《第三版 滿洲紳士錄》(東京:滿蒙資料協會,1940),頁

官僚的場所;凡赴各地的縣參事官或成為中央政府部門的幕僚前,都需受該院的培訓課程才可任職。<sup>19</sup>至於總務廳在滿洲國建國之初設置,主要目的係使日本殖民當局得以進一步控制,並瓦解原來中國東北各地舊勢力,達到集權之效。<sup>20</sup>大同學院和總務廳均屬殖民的關鍵機構,可見佐藤的能力備受肯定。因此在1940年出版的小書《滿洲及滿洲人》中,他能夠援請總務長官星野直樹(1892-1978)和大同學院院長井上忠也(1879-1950)分別寫序。<sup>21</sup>儘

938;中西利八編,《第四版 滿洲紳士錄》,頁434。另據《滿洲帝國大同學院同窗會名簿》所載:佐藤慎一郎退職轉任總務廳企畫處調查官室。大同學院同窓會本部編,《滿洲帝國大同學院同窓會名簿》(新京:編者印行,1941),頁7。

- 19 不著撰人,〈執政令·大同學院官制〉,《滿洲國政府公報》(新京),第23號,1932年7月11日,頁1。大同學院創建於1932年7月1日,與滿洲國的歷史相始終,據其招生辦法,可分為第1部(共19期)、第2部(共9期,再分為新、舊部),以及研究所(共2期)。第1部係自日本帝國園內(含殖民地臺灣、朝鮮)的大學或專科畢業生中遴選出來,而第2部則於1934年11月起成立,從滿洲國內高校畢業生或現職年輕官吏之中擇優錄取。貴志俊彦、松重充浩、松村史紀編,《二○世紀満洲歷史事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頁336-337。大同學院的初步討論,參見林志宏,〈地方分權與「自治」──滿洲國的建立及日本支配〉,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近代中日關係史新論》(新北:稻鄉出版社,2017),頁643-683;林志宏,〈冷戦体制下における大同学院同窓会──日本と台湾の場合〉,收入佐藤量、菅野智博、湯川真樹江編,《戦後日本の満洲記憶》(東京:東方書店,2020),頁254-258。
- <sup>20</sup> 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偽滿傀儡政權》(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437-438。總務廳的設立功能是「內面指導」,由日系人士出任官吏,專門輔佐國務大臣,總務長官便形同「幕僚長」。而國務院轄下各部,則設有總務司,司長聽命於總務長官。換言之,總務長官不僅成為日系最高官僚,也是日方控制滿方行政機構最具關鍵的角色,此即「總務廳中心主義」。相關說明參見:長谷川雄一,〈「満州国」創建期における政軍関係—関東軍の政治的役割—〉,《亜細亜法学》,18:2(東京,1984.5),頁143-168。
- 21 佐藤慎一郎,《滿洲及滿洲人》(新京:滿洲事情案內所,1940)。星野是神奈川縣橫濱市人,1934年至1936年任滿洲國總務廳廳長,嗣後1941年至1944年任東條英機內閣書記官,著有星野直樹,《見果てぬ夢—満州国外史—(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63)。井上是熊本縣士族之後,陸軍大學畢業,後為臺灣總督府陸軍大尉,1925年至朝鮮擔任第十九師團參謀長,以及大阪的師團司令部少將。「九一八」事變後,轉任下關要塞司令官,一年後赴任滿洲獨立守備隊司令官(均係中將),嗣後成為大同學院院長到戰爭結束,後被蘇聯軍隊帶往西伯利亞而過世。以上簡歷參見:岡田よし子,《父·井上忠也を偲ぶ》(出版地不詳:作者刊行,2004)。

管這是一本通俗性介紹讀物,卻愈發凸顯佐藤慎一郎在滿的人際 關係。

另一足可顯示佐藤慎一郎工作能力之例,是 1941年經滿洲國警務總局保安局委託,協助調查哈爾濱傅家甸當地一處知名的貧民窟——「大觀園」,並完成報告。這份報告書運用新興的照相技術,查訪了近 449位的商賈、乞丐、妓女及苦力等,以「科學」為角度記錄漢族社會底層的種種情況,包括市井衢巷內的「隱語」和「黑話」,並從中探索地下經濟的運作和潛規則。結果它標註為「極秘」,供厚生省作為社會病理學之探究,直到 1982年才披露出版。<sup>22</sup>相關參與調查者受「戰爭陰影」所影響,戰後都三緘其口,僅隱約透過小說題材或私人訪談來陳述。<sup>23</sup>

對許多海外的日本僑民來說,1945年8月15日帝國敗戰傳來可說是晴天霹靂;身處滿洲的佐藤慎一郎至此也展開攸關生死之歲月。他接連目睹蘇聯軍隊的無差別暴行,又先後遭到國、共兩黨逮捕,幾度面臨喪命之危,從而體驗中國民眾私下的人道救助和溫情。當獲悉日本戰敗之際,佐藤迅即加入新京(今長春)的日本人會,協助日僑遣返歸國事宜。這時的他充分感到亡國滋味,自忖「從現在開始,盡可能把日本人遣送回日本,接著也盡可能地將日本民族在滿洲所建立的文化,交還滿洲的民眾」。<sup>24</sup>嗣後佐藤更將自己所見所聞,化為文字,其中包括妹夫竹內德亥(1888-

<sup>22</sup> 満洲国警務総局保安局編,《魔窟·大観園の解剖》(東京:原書房,1982)。厚生省研究所人口民族部編,《漢民族の社會病理學的實態調查參考資料:滿洲國哈爾濱傅家甸》(出版地不詳:編者印行,1943),序言部分,頁1也說:「本篇超越獵奇的趣味,而以嚴謹科學精神理解中國下層社會之『惡』,乃至民族的『病灶』」。

主持該項調查工作的日本人共有三位,分別是:後藤令次、佐藤慎一郎、加藤豐隆。他們因為姓氏裡都帶有「藤」字,故當時還以「三藤組」(三藤グループ) 戲稱之。加藤豐隆於戰後撰寫的小說〈大觀園〉,刊於1971年7月的《芸文》上, 後收入書中。參見:加藤豊隆,〈大観園〉,收入加藤豊隆,《小說 大観園》 (松山:愛媛通信社,1974),頁169-243。

<sup>&</sup>lt;sup>24</sup> 佐藤慎一郎,〈どたん場における人間学―敗戦・亡国・獄中記―〉,收入佐藤慎一郎著,《佐藤慎一郎選集》(東京:佐藤慎一郎選集刊行会,1994),頁 230-231。

1946)被槍殺,更體悟中國共產黨的冷血與無情。

## 三、從「中國問題研究家」到「反共專家」

佐藤慎一郎的滿洲經驗和不快回憶,並未隨戰爭結束而煙消雲散,還深深影響其生活之中。不僅如此,冷戰情勢發展帶來世界政局的動盪,讓佐藤的身分開始有了全新定位。此後他不再是戰時「支那通」代表,用近人的話形容,反而被改裝成「破格錄取的中國研究家」。<sup>25</sup>

饒富興味是,這位對中國問題屢發言論的學者,恰與當時日本一般知識青年的左傾立場相違。他對共產思想的厭惡態度,先 是得自執教於拓大為契機,繼而連結到中國農村問題和中共的土 改政策上。這些實與佐藤的思想延續性密切有關。

## (一)「反共」思想的延續

檢討二戰前後佐藤慎一郎的思想延續性,有必要先釐清 1950 年代日本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尤其冷戰氛圍對東亞之影響。簡單來說,戰後日本雖非以東亞領導者自詡,惟因民主與共產兩種意識形態之相互抗頡,遂成為亞洲地緣政治下重要的國家。戰敗的日本最初係由美國占領,接著朝鮮半島爆發韓戰,以致東亞地區的戰略造成丕變;日本於是由敗戰中浴火重生,迅即邁往復興道路上,並化身為美國在亞洲最忠實的盟友。經過吉田茂(1878-1967)、鳩山一郎(1883-1959)、岸信介(1896-1987)等人組閣的時代,日本以親美為立國政策,致力發展經濟。<sup>26</sup>值得一提的是,原先戰前「反共」的原則大抵承繼下來,形成戰後日本政界的核心思想,同時還吸引了國內一批類似主張的人支持;擁有「中國經驗」的佐藤即為具體而微之例。

<sup>&</sup>lt;sup>25</sup> 長谷部茂,〈東洋学教授·佐藤慎一郎の人と学問:新生中国・中共に対峙した 拓殖大学地域研究の学統〉,《海外事情》,69:4(東京,2021.7),頁71。

<sup>&</sup>lt;sup>26</sup> 黃自進,《「和平憲法」下的日本重建(1945-1960)》(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9),頁94-101、頁135-158、頁195-231。

返抵國門的佐藤慎一郎,對戰後中國形勢的感受,可說是既複雜又糾葛。一方面,1949年適值國民黨及其政權的節節敗退,導致中華民國政府偏安彈丸隅地臺灣,國共雙方內戰的勝負漸趨明朗。另一方面,撤退來臺的中華民國則以「戰勝國」之姿和日本簽訂〈中日和約〉,雙方互派代表團訪問,中日與臺日關係的二元架構正式成形。<sup>27</sup>這些情勢對曾為「支那通」身分的佐藤而言,內心恐怕五味雜陳。1954年3月,佐藤以隨員身分跟舅父山田純三郎前來臺灣,參加蔣介石(1887-1975)、陳誠(1898-1965)的正副總統就職典禮,私底下又和多名黨政要人進行接觸。<sup>28</sup>事後他陳述其中的經過見聞,也透露出自己感想。有意思的是,關於蔣氏政治上排除異己,佐藤的態度深表嫌惡,認為中共獲致成功有其道理。<sup>29</sup>細審佐藤心思,或與1950年代日本國內的反美、左傾風氣有關,<sup>30</sup>至少對當時的中華民國和蔣氏政權而言,並無任何好感。

不過,直到佐藤慎一郎再度執掌教鞭後,態度上開始產生變化。其關鍵點是在他加入拓大的教師團隊後。拓大建校於1900年,係日本第12個私立大學,其前身原為桂太郎(1848-1913)所創辦的「台灣協會學校」,目標在培養經營殖民地所需人才。該校的名稱曾歷經東洋協會專門學校、東洋協會殖民專門學校等不同階段,最後1918年時才改為「拓殖大學」。校名稱謂的變遷象徵著拓大蘊含日本帝國對外擴張之意義,包括大正時期亞洲主義的昂揚,強調以地域研究為特色的東洋學/中國研究。其中,東洋

<sup>&</sup>lt;sup>27</sup> 楊子震,〈中國駐日代表團之研究——初探戰後中日·臺日關係之二元架構〉, 《國史館館刊》,19(臺北,2009.3),頁47-86。

<sup>&</sup>lt;sup>28</sup> 武井義和,《孫文を支えた日本人 山田良政・純三郎兄弟》(名古屋:あるむ, 2011),頁54。

<sup>&</sup>lt;sup>29</sup> 佐藤慎一郎,〈明暗二つの台灣〉,收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編,《研修資料(第3 集)》(東京:防衛研修所,1954),頁217-226。

<sup>30 1950</sup> 年代歷經「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野村浩一(1930-2020),回憶青春歲月時為我們提供了類似的印證。他說:「1951年簽訂了〈舊金山合約〉,1952年發生了『五一事件』……雖說我跟黨派沒有任何關係,但是當時我有一種强烈的感覺,那就是社會主義將來必定會實現。我認為很多人都在某種程度上有這樣的感覺,雖然這種想法有些流於學生氣。」參見村田雄二郎訪問,紀曉晶譯,〈野村浩一訪談錄〉,《國際漢學》,2010:2(北京,2010.11),頁29。

協會因涉及亞洲各方面活動,還成為提供官員、實業家和學者們交流的園地。該會機關刊物《東洋》上便刊載有許多專家學者的文章,如戰前有長野朗(1888-1975)、滿川龜太郎(1865-1946)等人,皆以研究中共而知名。<sup>31</sup>1955年6月,拓大繼承東洋協會的精神,決定設置「海外事情研究所」(簡稱「海外所」),糾集一批沒有在共產中國生活、卻擁有戰前中國經驗的人士加入。<sup>32</sup>

海外所的成員基本上和戰時日本防共、反共之立場相關。由於日本帝國以發展大陸政策及擴張所需,曾培養、派遣大量人員前往中國,展開地毯式的實地調查,完成龐大的資料和文獻。這樣約莫半世紀的知識訓練傳統,並未隨著戰爭結束而消失;當戰後「中共革命何以取得勝利」成為舉世關注的焦點時,過去嘗為戰爭服務的情資搜集與分析能力,遂開始轉向學術研究。因此,學者及學術機構取代了以往日本軍事、外交和民間機構,成為主要力量。<sup>33</sup>佐藤慎一郎本來「支那通」的角色及其經歷,於是改頭換面,被網羅至海外所,成為「中國問題研究家」之代表。然而,與戰後日本的中共黨史研究學者稍顯不同,<sup>34</sup>佐藤在思想上並非全然同情左傾,反而秉持否定共產主義的立場。如同服務海外所的草野文男(1915-1996)、小竹文夫(1900-1962)等人一樣,他不但積累相關研究資料,且對毛澤東(1893-1976)個人崇拜、土地改革乃至人民公社等作為,提出極為尖銳地批評。

<sup>31</sup> リン ヒュング (Hyung Gu Lynn), 〈政治と知識:東洋協会の情報・政治構想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 《拓殖大学百年史研究》,1、2 合併号(東京,1999.3),頁32;長谷部茂,〈東洋学教授・佐藤慎一郎の人と学問:新生中国・中共に対峙した 拓殖大学地域研究の学統〉,頁71-72。

<sup>32</sup> 長谷部茂,〈東洋学教授·佐藤慎一郎の人と学問:新生中国·中共に対峙した 拓殖大学地域研究の学統〉,頁71-72。

<sup>33</sup> 張屹、徐家林,〈異域之眼:日本的中共黨史研究〉,《黨史研究與教學》, 2021:2(福州,2021.4),頁94。

<sup>34</sup> 相關研究指稱,戰後中共黨史學者可概分為兩類:其一是由戰時情報人員轉型而來,其二純屬學術研究出身的學者。參見:許瑛,〈1945年-1972年日本學術界對中國革命的研究〉,《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2(瀋陽,2008.3),頁27;張屹、徐家林,〈異域之眼:日本的中共黨史研究〉,頁86。

應當指出的是:如此反共態度及其對中共抱持「批判否定 觀」,多少也反映在政治抉擇上。當1955年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 (1887-1957)提出「兩個中國」構想時,拓大及海外所成員則予以 附和,採取援助中華民國的立場。像拓殖大學的校長矢部貞治 (1902-1967)曾兩次造訪臺灣,並獲蔣介石謁見,足見其態度一 斑。35戰後佐藤慎一郎能被延攬至拓大海外所工作,或許與此不無 關連。另一項足以佐證其在政治光譜上的定位,可從他與日本豐 橋市的愛知大學關係上來看。眾所周知,愛知大學的成立係以原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為核心,再加上糾合帝國時期的殖民地大學 (京城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新京建國大學)等教職員共同 創設,目的是為了提供「外地」大學歸國復員的學生有容身之 處。但戰後日本社會理解東亞同文會和同文書院過去在華的活動 時,多半予以負評,故相關研究「有一段時間在愛知大學校園內 被視為是禁忌」。36然而,佐藤卻在1969年前後與愛知大學建立不 少關係,包括受邀至「霞山會」講演文革後中共社會的實態,甚 至因為山田家兄弟的緣故,公開接受口述訪問,其錄音如今也典 藏在霞山文庫中。37

(二) 反對土改、人民公社及農業集體化

<sup>35</sup> 馬場公彥,〈「文化大革命」在日本(1966-1972):中國革命對日本的衝擊和影響〉,《開放時代》,2009:7(廣州,2009.7),頁58。矢部是鳥取縣人,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畢業,曾任東京大學法學部教授。戰後任教於早稻田大學大學院,1955年為拓殖大學校長;1956年8月由日本國會議員組成的「日本各界中華民國親善訪問團」抵臺,矢部即為重要成員之一。其生平參見:金田進編,《鳥取県百傑伝:近代百年》(鳥取:山陰評論社,1970),頁131-136。參見:林果顯,〈1950年代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談判〉,《國史館館刊》,71(臺北,2022.3),頁150-153。

<sup>36</sup> 馬場毅、黃英哲,〈介紹日本愛知大學所藏中國近代史關係資料—霞山文庫與山田良政·純三郎檔案—〉,《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6(臺北,1998.9),頁140。

<sup>37</sup> 霞山会編,《霞山会 50年史》(東京:編者印行,1998),頁226;今泉潤太郎、藤田佳久,〈孫文、山田良政・純三郎関係資料について〉,《愛知大学国際問題研究所紀要》,97(名古屋,1992.9),頁413-513;伊藤隆、季武嘉也編,《近現代日本人物史料情報辞典 4》(東京:吉川弘文館,2011),頁270。按:「霞山」二字即為東亞同文會創辦人近衛篤麿(1863-1904)的號。

是以,佐藤慎一郎發表有關對中共言論,不難想見帶有特定的立場和觀點。綜觀佐藤文字,大致可歸納出幾項特徵。首先是他對中共建政後一連串的思想改造運動表示不以為然,認為中共藉此宣揚革命,目標達成全面控制。當「三反運動」初始之際,佐藤以「中國研究家」身分論及陸志韋(1894-1970)、齊思和(1907-1980)、聶崇岐(1903-1962)、沈迺璋(1911-1966)等人的下場,說他們是被自己的兒女或學生批鬥,並冠上親美通敵的莫須有罪名。另外,全中國各校開始組織學生會和委員會,齊力貫徹黨的意志及其政策,進行各項活動,佐藤對這些徹底改變傳統中國的親屬關係,深感憂心。38儘管中共素來強調以「塑造新人」為其理念,39但他視其本質無疑是根本破壞了基層社會的傳統信念。在另一篇文章中,佐藤還不時提醒讀者:所謂「中國革命」,其實就是藉由軍隊、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等「三寶」,進行對民眾思想的掌控;40如此過度擴張黨化的結果,當然導致高等教育素質低落,無法形成真正對國家有益的知識階層,影響甚鉅。41

其次,佐藤慎一郎批判中共政策最烈之處在於土地改革上。 細究他諸多想法,係源自戰前的「中國經驗」。在滿洲國時,廣 大農村的破產現象也是殖民當局所亟欲解決之問題,因此官方啟 動各式各樣的調查工作,且屢有設立模範的「實驗村」呼聲。<sup>42</sup>前

<sup>&</sup>lt;sup>38</sup> 佐藤慎一郎,〈中共における思想改造運動〉,《アジア問題》,8(東京,1953.9),頁30-39。

<sup>39 「</sup>新人」概念在近代中國發展來自晚清「新民說」,後由中共援引蘇聯經驗及加以宣傳,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思想改造之標準。相關討論參見: 王汎森,〈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收入王汎森等,《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頁171-200;余敏玲,《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頁18-30。

<sup>40</sup> 佐藤慎一郎,〈中国共産党の社会統制力の実相〉,《アジア問題》,3:2(東京,1955.8),頁72-81。

<sup>41</sup> 佐藤慎一郎,〈中国の高等教育と知識階級の諸問題〉,《アジア問題》,8:2 (東京,1958.2),頁78-88。

<sup>&</sup>lt;sup>42</sup> 井上實,〈農本建設の起點 模範村の經營につき〉,《大亜細亜》,3:3(東京,1935.3),頁2-9。相關討論參見:林志宏,〈重建合法性——滿洲國的地方調查、模範村及其「教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17(臺北,

述佐藤專程親赴山東考察鄉建成效,亦為此一背景下之舉動。對他來說,地大物博的中國絕大部分皆屬農村,農民幾乎占總人口的多數,故發展經濟應以建設農村為要,尤其是改造與農業相關的金融組織。唯有如此,中國農民方有餘力投入自己的耕種土地、農具改良和豢養牲畜上。而中共推行土地政策,與其說是「改革」,還不如說是一種「革命」;它完全基於一種鬥爭的本質,動員農民鬥垮地主階層,甚至以發展生產力為名改變生產關係。<sup>43</sup>佐藤說:農村問題固然在滿洲國時代也曾出現過,但並非以訴諸暴力來解決。如今日本國人所盛讚中共的土地改革,委實相當「無知」;因為要真正解決農村問題,只有推動像過去那般的鄉建運動才行。<sup>44</sup>

戰後所有著作中,佐藤慎一郎耗費最多心力的即為評價「人民公社」。他批駁這是毛澤東為了滿足一己私慾、「實現大同世界」的幻夢;還舉例滿洲國涉及「大同」口號為借鑒,警告不過只是妄想而已。<sup>45</sup> 佐藤最先開展此一討論,是在1959年出版的《賭上新中國命運的人民公社》(《新中国の命運をかけた人民公社》)一書上,且邀時任參議院議員的高橋衛(1903-1986)寫序。高橋的論點反映出佐藤主張;他就直言:人民公社並非什麼創舉,毋寧有其歷史淵源,是為瞭解決農村破產問題。從這方面來說,成立人民公社可視為戰時「集團部落」議題之延續。高橋又說到佐藤編寫該書目的,不獨為視察和印象之紀錄而已,其分析更可說站在堅實的資

<sup>2022.9) ,</sup> 頁99-106。

<sup>43</sup> 這些討論分別都在1960年代初期。佐藤慎一郎,〈中国における経済建設の諸問題〉,收入アジア経済研究所編,《中国における経済建設の諸問題》(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61),頁105;佐藤慎一郎,〈中国大陸における農業の現状と将来(下)〉,《師と友》,14:2(東京,1962.2),頁23。前文標示於1960年3月14日在東京工業俱樂部,應為演講紀錄,後文原是〈中国大陸における農業の実態とその影響〉的續篇。

<sup>44</sup> 長谷部茂,〈東洋学教授·佐藤慎一郎の人と学問:新生中国·中共に対峙した 拓殖大学地域研究の学統〉,頁71-83。

<sup>45</sup> 包括使用年號的「大同元年」、新京的「大同大街」,還有「大同學院」等。佐藤慎一郎,〈中国民族の幻想——人民公社〉,《月刊世界政経》,1:2(東京,1972.4),頁24-32。

料基礎上而進行。因此結論裡他聲稱:該書實對戰後日本政局的 左傾風潮提出反思,不應被中共宣傳所眩惑。<sup>46</sup>

此後佐藤慎一郎分析中共,更加備受各界矚目,特別是關於人民公社和農業集體化政策的課題上。1960年代起,他屢受亞洲經濟研究所委託,多次赴香港調查(詳下節),先後撰成相關著作,並得到所長東畑精一(1899-1983)所肯定。<sup>47</sup>特別值得玩味的是《中國共產黨之農業集團化政策》(《中国共産党の農業集団化政策》)書中附錄的年表。佐藤將農業集體化的工作源頭溯自晚清民初,正呼應了前述高橋的說法。也因如此,國際歷史學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ICHS)特別彰顯其學術貢獻,說他描述到農業集體化特徵,是「從資料方面詳細地追尋了它的歷史發展過程」。<sup>48</sup>至於由民間社團編纂的《中國政治經濟綜覽》(《中国政治経済綜覧》),也找佐藤慎一郎專章談及人民公社情況,<sup>49</sup>儼然成為代言者。當1966年10月26日佐

<sup>&</sup>lt;sup>46</sup> 高橋衛,〈序〉,收入佐藤慎一郎,《新中国の命運をかけた人民公社》(東京:鋼書房,1959),頁1-2。

<sup>47</sup> 分別是:佐藤慎一郎,《中国共産党の農業集団化政策》(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61);佐藤慎一郎,《農業生産合作社の組織構造》(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63);佐藤慎一郎,《人民公社の組織構造》(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64)。東畑精一係日本知名的農業經濟學者,1936年與蠟山政道共同組織「昭和研究會」,後為東京大學教授。村上保男,《日本農政学の系譜》(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2),頁220-236。

國際歷史學會議日本國內委員會編,宮長為、趙德生、高樂才譯,《戰後日本的中國現代史研究綜述》(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1988),頁19-20。國際歷史學會成立於1926年的日內瓦,當時由來自22個國家的國家歷史學會和一些史學家團體所組成,國家包括來自歐洲(包括蘇聯)、美國、日本、巴西和阿根廷等,中國於1938年加入。學會組織基本上並不接納史學家個人為成員。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國際歷史學會是為了克服當時瀰漫於各國史學家之間濃厚的民族主義氣息,力圖增進世界各地人民的相互瞭解。從方法論上而言,是為了加強史學家的協作,進而超越當時盛行的國別史研究模式。相關討論參見:Karl Dietrich Erdmann, 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gres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898-2000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5).

<sup>49</sup> 佐藤慎一郎,〈人民公社〉,收入アジア政経学会編,《中国政治経済綜覧 昭和 41年版》(東京:民主主義研究会,1966),第四編第二章,頁353-362。

藤與張公權(1889-1979)偶遇相談時,兩人的話題也是集中於此,席間並詈罵毛澤東個人倒行逆施的作為。<sup>50</sup>

## 四、前往冷戰的「東方卡薩布蘭加」

面對共產新中國的種種,佐藤慎一郎不再是一位躲在書齋的 學者,而是走向公眾,藉輿論傳達反對之聲。1964年,一本名為 《怎麼看中共?》(《中共をどうみるか》)的專書,特邀佐藤 以「中國問題研究家」身分撰文。他高唱中共只向蘇聯一面倒, 對自身文化傳統完全忽略,誤解了民族革命的真諦。<sup>51</sup>幾乎就在同 時,日本舉國廣泛密切注意中共動態,各處報導和演講活動此起 彼落,<sup>52</sup>促使佐藤特別留心任何可能獲得訊息的管道。結果他是選 定從距離中國大陸最近的「東方明珠」一香港來著手。

## (一) 戰後香港的情勢及美國因素

毫無疑問,伴隨冷戰情勢開展和共產鐵幕形成,香港頓時變成特殊且關鍵的地區。對西方民主和資本主義陣營世界而言,可以利用香港監視中國刻正發生的事情,並發揮圍堵的戰略效益;反之以共產中國來說,香港也形同向外保持聯繫的窗口,偶爾還可發揮分化英美同盟的作用。53是以,冷戰中的香港正是民主和共產對立間所架設之橋樑,從而保有中國和世界的妥協。如此情勢同樣造就香港內部民眾認同的紛亂,顯現中國/祖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各勢力的角逐。以歷史課程為例,儘管已有

<sup>50</sup> 姚崧齡,《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下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頁 1187-1188。據張氏日記可知,佐藤慎一郎贈送《日本人農民在中國農村生活紀錄》(係據由滿洲返日之日本農民談話而成)、《中國共產黨之農業集團化政策》及《人民公社之組織構造》三書。

<sup>51</sup> 佐藤慎一郎,〈中国の民族問題と中共政策の根本矛盾〉,收入時事問題研究所編,、《中共をどうみるか》(東京:時事問題研究所,1964),頁94-106。

<sup>52</sup> 譬如和佐藤關係極深的大同學院同窗會,首次舉辦了有關中共動態的演講,邀請 《讀賣新聞》的資深記者進行講演。不著撰人,〈最近の中共事情きく〉,《大 同学院同窓会報》,27(東京,1966.6),頁5。

<sup>53</sup> 麥志坤著,林立偉譯,《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1949-1957》(香港:中華書局, 2018),頁13-43。

英制香港大學的殖民教育,可是亦有懷抱祖國強烈情感的教學, 甚至還有中共在此傳布階級鬥爭之史觀。<sup>54</sup>可以說,香港正是一處 複雜且多元的地方。

最能凸顯上述複雜面向,是香港同時兼具有國、共兩黨和「第三勢力」等的政治宣傳。香港第三勢力係由顧孟餘(1888-1972)、張發奎(1896-1980)、張君勱(1887-1969)等人結成,立場介於國、共之間,力主政治上擁有自由民主,希望在中國大陸「赤化」和困頓中尋求出路。他們以報刊為陣營,發表反共輿論;惟自 1953 年以後,來自臺灣方面的國民黨多方拉攏,還有美國不再支持的因素下逐漸萎縮。55國民黨在港各項政治活動,由於受到1950年1月英國承認中共政權所限,無法公開運營,僅能轉往地下的「海外工作指導」。儘管國民黨積極向勞工階層宣傳,甚至極力爭取華人商會中的領導權,但因欠缺明確、長遠的目標,成效始終不彰。至於中共對港則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56以政治和經濟考量允許香港維持現狀,但也同時發展群眾組織工作,通過工會、辦學和辦報等製造有利輿論,而非以推翻港英政府為目的。兩黨在港的宣傳工作,就連電影媒體業的發展也不分軒輊,經常處在左右意識形態爭奪和社會協商的過程之中。57

<sup>54</sup> 像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三種力量均各擅其場。以二戰論述來說,即有所謂「光復紀念日」(港英殖民政府)與「中國抗戰勝利日」(本地左派報章呼應中共)之別。前者係將香港納入世界史的脈絡,探究香港在戰後發展,以及世界政治環境與本地社會的關係,關注本地的事務。然而,後者透過轉載中國國內的紀念情況,論述中國和蘇聯在結束抗戰勝利的貢獻,從而打擊美國等冷戰敵對陣營,宣揚中共的政治主張。參見:林啟彥,〈戰後香港地區的中國近代史教研成果〉,收入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研究新趨勢》(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18;朱維理,〈1960年代以來香港初中中國歷史及歷史課本與二戰歷史記憶〉,《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55:2(臺北,2017.6),頁

<sup>55</sup> 黃克武,〈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1949-1953)〉,《二十一世紀》,162 (香港,2017.8),頁47-63。

<sup>56</sup> 齊鵬飛,〈「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49年至1978年新中國對於香港問題和香港的特殊政策〉,《中共黨史研究》,1997:2(北京,1997.5),頁23-30。

Jing Jing Chang, Screening Communities: Negotiating Narratives of Empire, N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Hong Kong Cinem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然而,面對不同意識形態之分立,冷戰初期香港民眾的心態 又是如何?以下這段來自1960年代的觀察,或許較貼近真實景 象:

這裡充斥中共派、國府派,還有反中共反國府的第三勢力,可是大多數居民是「迷途羔羊」。這些「迷途羔羊」們多為難民,秉持著反共的態度,在祖國歷經人民公社的失敗和糧食艱難,加上國府派和反共第三勢力的宣傳所利用,完全充滿反共的心態。就像是理解京劇的成功般,一邊對祖國懷抱著偌大地鄉愁,另一方面不考慮回歸祖國,對政治毫無關心,寧可在香港過著優渥的生活,以追求眼前利益為主。58

大抵說來,此時大部分群眾是偏向港英政府「政治中立」的立場,既對中共不存好感,也痛恨國民黨施政無能。<sup>59</sup>結果視溫飽問題為前提,「毫無政治意識」似乎成為戰後香港百姓最大的公約數。

而思考冷戰期間香港的國際處境,我們不得不環顧美國對此城市的影響。二戰後,美國積極推展各項反共政策,試圖運用文化交流和經濟援助方式,爭取世界民意的爭鬥(the battle for world opinion);同時又以反共為號召,強化自身的文化產品及「自由」(freedom)之間的象徵關聯(symbolic associations)。<sup>60</sup>其中,香港來自中國內地大量流亡的難民潮,更促使西方人道主義者關懷其動向。誠如學者所言:在美國非官方慈善組織所支持的香港難民調查工作裡,皆以政治問題為導向,訴諸北京政權的邪

<sup>2019);</sup> Sangjoon Lee, Cinem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US Diplom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sian Cinema Network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0).

<sup>58</sup> 姫宮栄一,《香港:その現状と案内》(東京:中央公論社,1964),頁157。

<sup>59</sup> 朱維理,〈香港的「中國」歷史意識:1960年代以來初中中國歷史教科書與社會 論述的轉變〉,《思想》,31(臺北,2016.9),頁115。

Walter L. Hixson, Parting the Curtain: Propaganda,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1945-196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惡,<sup>61</sup>遑論半官方團體?相關教育機構如新亞書院接受補助,進而成為傳遞中華文化的陣營;<sup>62</sup>又如在香港的美國新聞處(U.S. Information Service in Hong Kong),更聚集一批流亡的作家,創作出蔚為可觀的「反共小說」,其中還包括張愛玲(1920-1995)撰寫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兩部作品。質言之,美國利用文化宣傳將中共詮釋為「非中國性」(un-Chinese character),形成另一種「華夷之辨」。<sup>63</sup>

釐清上述文化冷戰的宣傳性質,絕非毫無意義。事實上,在 冷戰最為激烈緊張時刻,美國徵集了一批心理、社會和政治科學 家的幫助,將「敵人」的行為制定成各種藍圖。這些學者不僅將 共產主義的社會妖魔化,甚且試圖影響到對韓戰和越戰的決策。<sup>64</sup> 反觀中共對待香港問題,則猶如芒刺在背般,是一處威脅與誘惑 共存的地方。香港於是成為鐵幕內可輸出土產、換取外匯,還有 進口必需或戰略物資的「缺口」。<sup>65</sup>再者,以「自由民主櫥窗」為

<sup>61</sup> Laura Madokoro, "Surveying Hong Kong in the 1950s: Western Humanitarians and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Modern Asian Studies*, 49: 2 (March, 2015), pp. 493-524; Glen Peterson, "Crisis and Opportunity: The Work of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CI)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in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eds.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41-159; 王梅香,〈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的東南亞文化宣傳(1951-1959)〉,《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2:1(臺北,2020.3),頁123-158。

<sup>62</sup> Grace Ai-Ling Chou,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at Hong Kong's New Asia College, 1949-63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1). 中譯本參見:周愛靈著,羅美嫻譯,《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

<sup>63</sup> 翟韜,〈冷戰語境下的新「華夷之辨」——美國對華宣傳與兩岸政權形象的塑造〉,《史學月刊》,2016:2(開封,2016.2),頁79、頁98。時任香港美新處主任理查德·麥卡錫(Richard M. McCarthy)形容《秧歌》就像是「美新處的產兒」(USIS Baby),而《赤地之戀》一書甚至直接肩負起美國宣傳機構恐嚇華僑學生赴中國大陸求學的「政治任務」。

Ron Robin, The Making of the Cold War En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Military-Intellectual Complex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sup>65</sup> 丁中江,〈序〉,收入江南,《香港記行》(臺中:臺灣日報社,1966),無頁碼。 「江南」係劉宜良(1932-1984)筆名,當時《臺灣日報》發行人夏曉華(1919-2003)授命劉氏前往香港(1965年2月12日至23日),結果先在報上刊載後出版成

條件,香港的城市繁榮既帶給共產主義一種對未來憧憬與想像, 還有邁向「善治」的可能。

### (二) 佐藤的香港訪察及其對「日中正常化」的態度

借助於美國從難民身上攫取蘇聯情報的辦法,<sup>66</sup>佐藤慎一郎也成為日本方面的先驅者。在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後,隔年他和拓大成員組織考察團前來,<sup>67</sup>嗣後更開啟調查模式,至少連續三年期間都在當地展開訪談活動。

香港和日本的聯繫關係發生極早,可推至1842年10月;<sup>68</sup>不過,真正大幅度接觸應為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戰事發生前,香港以自由港口而聞名,政治上雖屬英國殖民管轄,但成為商業貿易的轉運點,也是國際社會的情報中心。美國、蘇聯、日本等國皆設有相關辦事機關,藉此暗地搜集情資;就連中國方面亦不遑多讓,有共產黨員居間活動。<sup>69</sup>為了充分進行反偵測和掌控局勢,香港總督轄下的警務處刑事部於1934年成立「政治部」(Special Branch)。<sup>70</sup>即使後來中日戰事爆發,仍有國民黨的地下人員潛伏於此。<sup>71</sup>

書。

<sup>66</sup> 藤岡真樹,〈冷戦初期のアメリカ合衆国の大学におけるソ連研究の諸相:ハーヴァード大学難民聞き取り計画と学知の「停滞」〉,《史林》,99:3(京都,2016.5),頁419-456。

<sup>67</sup> 陳湛頤、楊詠賢編,《香港日本關係年表》(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2004),頁303。

<sup>68</sup> 主要是日本「觀音丸」船員遇風漂流至菲律賓,歷經十個月從馬尼拉乘船赴澳門,途經香港停留二至三天。対外関係史総合年表編集委員会編,《対外関係史総合年表》(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頁878。

Chan Lau Kit-ching,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in Hong Kong, 1921-1934," The China Quarterly, 164 (December, 2000), pp. 1044-1061.

<sup>70</sup> 港英政治部身為特務機構,一向為冷戰時期時人所詬病,甚至因為虐待嫌犯有兩次鬧到英國國會。該部於1962年甚至設立集中營於維多利亞道,予以非法拘禁。 唐柱國,《燕京舊語》(臺北:雙十字出版社,1966),頁151-157。

<sup>71</sup> 劉維開,〈淪陷期間中國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活動〉,收入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0),頁477-499。

直至日本占領香港後,日方積極推動皇民化教育,到處可見 懸掛太陽旗和修改相關地區、建築物的名稱,歷經了三年又八個 月後才「重光」恢復。這段期間,日本帝國雖以軍事和政治的統 制凌駕一切,惟與文化相關治理亦帶來若干影響。<sup>72</sup>包括對自治組 織(街坊)和宣揚「東亞共榮」的精神,某種程度皆被承繼下 來,便源自日佔期間的啟發。戰爭結束後,港英政府恢復殖民統 治,以「不干涉主義」對居民進行治理,又推崇「自由」(含政 治言論、金融政策、轉口貿易等)為口號,形成一種「非意識形 態之意識形態」的管理。<sup>73</sup>因此,日佔時期可謂為香港史上的第一 次分水嶺也不為過。

值得注意是,殘酷的戰爭記憶沒有阻斷日、港往後的交流。儘管戰後尚有多件戰犯審判和索償活動展開,然日本對港的商業和經濟並未停歇,甚至還超越中國本身。如1947年12月7日,駐日的中國商務代表唐菊生說:「香港已代替上海為中日貿易之中心,數量可觀之奢侈品及我國不准進口之貨物,現正不斷自日本流入香港,然後走私運入國內」。74隔年7月港英的駐日代表也公開聲稱:「港府目前並不鼓勵亦不限制對日貿易,政府所做的只是設立機構,使港日貿易成為可能。」75兩段史料均顯示,戰後初期港府還秉持商業發展和自由貿易的態度,持續維繫與日本民間

72 相關討論參見:曾香屏,〈日本統治下的香港—以日本文化的移植為中心—〉 (臺北: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崇潤之,〈太平洋戰爭期間 日本對香港的文化統制〉(蘇州:蘇州科技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2018)。

程贊奇 (Prasenjit Duara) 形容這是一種「新帝國主義」 (new imperialism) 的發展。杜贊奇著,趙洪瑋、韓威譯,〈1941-1966 年香港與東亞新帝國主義〉,《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 (青島,2008.7),頁25-28; Prasenjit Duara, "Hong Kong as a Global Frontier: Interface of China, Asia, and the World," in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eds.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211-230. 也有學者認為:二戰後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因之改弦易轍,採取漸進的姿態來面對各項社會問題。鄺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5),頁22。

<sup>&</sup>lt;sup>74</sup> 〈唐菊生氏談對日貿易前途可慮〉,《大公報》(上海),1947年12月7日,6版。

<sup>75 〈</sup>香港對日貿易關係。不難達到出入平衡 駐日代表堅力最近返港談話〉,《大公報》(香港),1948年7月27日,6版。

#### 社會之交流。

而戰後日本對香港的文化的關切,美國當然是無法忽視的一環。二戰後初期日本在經濟上可謂捉襟見肘,端賴美國提供援助以擺脫凋敝之局。與東亞其他鄰近的國家一樣,美國對日本的教育援助也徹底改善了學術研究條件,許多相關活動紛紛開啟。<sup>76</sup>可以想見,此後日本跟隨美國的學術和知識腳步,當然不免招致爭議。像1962年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即以研究近代中國為由,向東洋文庫挹注大筆資金,曾激起日本年輕的中國研究者發出嚴厲批判。<sup>77</sup>佐藤慎一郎也置身其中,頗能反映時代之軌跡;像是他參加1960年井上勇(1901-1985)翻譯法國記者羅伯特·吉蘭(Robert Guillain, 1908-1998)的書中,充分顯現其立場是站在當時美國的東亞觀。因為吉蘭原書名直譯為「六億中國人」,但日文版卻刻意採用了英文版翻譯,逕自改為「六億之蟻」。<sup>78</sup>不僅如此,佐藤的香港訪行之舉,更應從此一角度來省察。

1968年12月起,佐藤慎一郎便在如此宛若「二戰時期的卡薩布蘭加」,<sup>79</sup>多次採訪姚脫鐵幕的中國人,通過他們解讀中共政治

<sup>76</sup> 白玉平、曲鐵華,〈冷戰時期(1945-1975)美國基金會對日本教育援助項目探析——兼論戰後日本教育發展歷程中的美國因素〉,《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4(長春,2017.7),頁201。

<sup>77</sup> 其中,小野信爾(1930-)公開撰文質疑,結果這些資金雖由東洋文庫接受,但用在充當購買圖書的費用上。小野信爾,〈A·F資金問題と中国学術代表団招請運動——懷柔と分裂の策動への反攻〉,《歷史評論》,159(東京,1963.11),頁14-23。小野畢業於1954年的京都大學文學部,1959-1962年參加《亞洲歷史事典》(10卷本,平凡社刊)的編寫,時為京都的花園大學教授。參見嚴紹盪,《日本的中國學家》,頁524-525。

<sup>&</sup>lt;sup>78</sup> 法文版參見: Robert Guillain, Six cents millions de Chinois sous le drapeau rouge (Paris: Julliard, 1956). 後來隔年有英文版問世,名為The Blue Ants: 600 Million Chinese under the Red Flag,日文則以此定名。參見:ローベル・ギラン著,井上勇譯,《六億の蟻:私の中国旅行記》(東京:文芸春秋新社,1957)。佐藤為該書撰寫的文字在頁242-257。

<sup>79</sup> 江南,《香港記行》,頁44。卡薩布蘭加(Casablanca)是摩洛哥(Morocco)最大的城市,位在大西洋岸邊。二戰期間,該城市被親德的法國維琪政權所管治,後被盟軍攻占,曾有多方間諜在此活動。以卡薩布蘭加形容香港在冷戰時期的地位,係來自劉宜良的譬喻。

現狀。與先前分析中共的農業集體化政策迥異:佐藤不再只有聽聞來自赤色政權內日本人的片面之詞,也非僅是披覽相關文獻報導,<sup>80</sup>而是親訪那些「脫出者」,瞭解他們的態度並度察中共統治情勢。相關零星的記載中還提到,引介逃脫難民的中介人,有的甚至其父為日軍所殺害,惟仍親切地協助接受採訪工作。<sup>81</sup>此外,佐藤發現這些難民尚有兩項特點:一是毛澤東掌權時代後成長的青年男女,另一係來自農村,<sup>82</sup>說明人口稠密的中國群眾和年輕人普遍地對共黨感到失望。還有一次是在1969年8月,廣東省陽江縣發生集體逃亡事件,有58名農民冒著生命危險越境潛入香港,藏匿於九龍某處的舊式公寓之中。當時佐藤趁機訪問這群人,其中還有曾是紅衛兵成員;據其描述,這位知識青年嘗積極參加過社會主義建設,嗣後卻覺得未來無望而自暴自棄,直迄投奔自由為止。在駐留香港的40日期間,佐藤慎一郎與這些逃脫者一同生活,充分感受其強韌的生命力,日後還偶接收到難民來信,提供更多資料。<sup>83</sup>

這些訪談內容,後來變成1970年代佐藤慎一郎堅決批判文化 大革命的依據,<sup>84</sup>也使他在國際社會針對「兩個中國」議題上選擇 親臺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正值此一階段,佐藤開始和臺灣的「國 際關係研究所」(簡稱「國關所」)合作,每年參加研討會。國

<sup>80</sup> 如對中國糧食危機的參考,佐藤係以華盛頓方面報告、《讀賣新聞》之外,還有從長沙歸國的前田伸一、日本水泥技師夫妻等訪問中得悉。佐藤慎一郎,〈中国大陸における農業の実態とその影響(上)〉,《師と友》,14:1(東京,1962.1),頁21。

<sup>81</sup> 瀬川五郎等,〈訪韓·訪台で感じたことども〉,《大同学院同窓会報》,41 (名古屋,1970.1),頁5。

<sup>82</sup> 湯ノ恵正行編,佐藤慎一郎著,《中国人から見た中国の現状―中国人の物の考え方―》(大阪:新教育懇話会,1973),頁13-14。

<sup>83</sup> 佐藤慎一郎,〈雲外の天は常に青天なり〉,《海外事情》,17:12(東京,1969.12),頁49-56。有一則新聞提到:佐藤有封信係難民寄來,提到「大陸女子嫁人,要看對方的配糧有多少」的荒誕內容。〈大陸女子找對象 看他配到多少糧七追六先五可以 二下不要問老娘〉,《聯合報》(臺北),1977年3月28日,3版。

<sup>84</sup> 張雅晶,〈「文化大革命」時期日本人的文革論〉,《史學月刊》,2001:3(開封,2001.6),頁83。

關所前身為抗戰時期籌組的「國際問題研究所」,主持人為中日問題專家王芃生(1893-1946);戰後則在蔣經國(1910-1988)出面要求下,改以「研究匪情」而由卜道明(1902-1964)、吳俊才(1921-1996)等人成立,後來隸屬於政治大學體制內,專門扮演「敵前養士」之功能。<sup>85</sup>該所曾以「中國大陸問題」為名舉辦多屆學術會議,並有專題報告及小組討論。研討會最初旨在「使日本學術界人士,看到中華民國反共的決心與朝氣」;佐藤慎一郎即以代表日方「中國問題研究員」的身分出席,強調「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是中華民國而不是中共,……因此日本認為中華民國就是代表中國的正統政府」。<sup>86</sup>

1970年代初中華民國適處於風雨飄搖之際,除了失去聯合國席次外,就連最重要的外交盟友——美國也和中共一齊發表《上海公報》。換句話說,這時「武力反攻」已不再具備任何實質之意義,謀求國際社會認可及生存,反倒成為中華民國在臺灣刻不容緩的工作。職是之故,國關所經常籌辦學術交流的研討會,目的既是為了尋求溫暖與掌聲,也是積極拉攏相同立場外國學者之辦法。只不過,這些對佐藤慎一郎個人來說,係藉由這些討論交換中共資訊,<sup>87</sup>同時是秉持自己戰前「滿洲經驗」以來的初衷。當1972年9月日本決定和中共建交時,一切情況變得更加複雜;身為反共鬥士的佐藤,態度必然反對,為此曾串連日本的民間團體發動抗議,並發表演說。<sup>88</sup>

「日中正常化」起自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應周恩來(1898-1976)

<sup>85</sup> 劉曉鵬,〈敵前養士:「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前傳,1937-1975〉,《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2(臺北,2013.12),頁145-174。

<sup>86</sup> 引文俱見:〈欲謀與匪進行談判 應記過去教訓 中日學者忠告民主國家 大陸問題座談會昨閉幕〉,《聯合報》,1971年12月25日,2版。

<sup>87</sup> 有篇關於「內部文獻」的討論中,佐藤自承部分由臺北某機關入手,可以佐證。 佐藤慎一郎,〈昆明連区政治部(秘)資料——中国はどのような意図のもとにニ クソンや田中首相を招いたのか?・昆明軍区政治部宣伝部が、所属部隊の参考 教材として編集した「教育大綱」が語る毛沢東革命外交路線の実態〉,《諸 君!日本を元気にするオピニオン雑誌》,7:10(東京,1975.10),頁177。

<sup>88 〈</sup>日各民間團體擴大活動 反對田中內閣媚匪 將在東京舉行大規模群眾大會 喚起 戰後遣回軍民毋忘我恩德〉,《聯合報》,1972年9月18日,1版。

之邀,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訪問,嗣後簽署兩國聯合聲明,恢復 邦交。<sup>89</sup>佐藤慎一郎公開撰文,強烈地抨擊田中毫無信用,背棄與 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是「為利棄義」的小人。90相當戲劇化的發 展是,中共利用會面的儀式蓄意羞辱田中角榮,幾乎等同印證佐 藤的看法。當時田中拜訪周恩來,周氏寫下《論語・子路》中 「言必信,行必果」六字;嗣後再與毛澤東見面時,毛氏則贈 《楚辭集注》,直把屈原比附為田中。佐藤認為這些贈予動作的 背後,其實另有深意,然輿論媒體卻無表明。他說,兩位中共政 治領導人是充分運用了古典文學的「歇後語」功能,亦即把真正 表達的意念隱藏起來,而非直接明說。再者,當時日本與中共建 交,另一附帶功能係前者借款300億日圓作為開發之用;而「言必 信,行必果」一語象徵兩國最終達成共識,締結國交。可是,這 段文字的後面接著還有「硜硜然小人哉」,卻未提出,無疑才是 想要傳達的內容。針對如此情形,佐藤深喟:日本全體國民為此 蒙上污點;至少直到10年後,他仍抱持著如此看法。<sup>91</sup>即使文革結 束後鄧小平(1904-1997)時代的來臨,佐藤仍覺總人口擁有80%農 民的國度,若持續於獨裁統治,始終還是無法邁向國家安定的道 路。92

## 五、結論

佐藤慎一郎的反共言論,究屬日本社會常態,抑或冰山一 角?限於資料我們很難確切地回答。不過,倒有兩本政治立場上 偏右的書籍,顯示了近年來日本社會迴響情形。一是2000年《日

<sup>&</sup>lt;sup>89</sup> 這段過程請參見:林金莖,《戦後の日華関係と国際法》(東京:有斐閣, 1987),第六章,〈日「中」国交正常化〉,頁93-123。

<sup>90</sup> 佐藤慎一郎,〈中国人の心〉,《海外事情》,21:2(東京,1973.2),頁19-26。

<sup>91</sup> 佐藤慎一郎,〈中国から見た日中条約〉,《師と友》,31:1(東京,1979.1),頁23-29;佐藤慎一郎,〈中国人から見た日中友好と中国大陸の現状 (二)〉,《師と友》,35:9(東京,1983.9),頁21-24。

<sup>92</sup> 佐藤慎一郎,〈鄧小平時代の到来〉,《月刊カレント》,18:5(東京,1981.5),頁11。

本之危機》(《日本の危機》),<sup>93</sup>作者櫻井良子(1945-)即活躍於政壇上的人物,內容中便言及周恩來贈字幅和佐藤抗議情事。該書三年內重刷24次,應屬暢銷之作。另一本則係2016年由鬼塚英昭(1938-2016)過世前出版,書名乾脆直接高舉佐藤姓名,且劍指田中角榮就是賣國賊。<sup>94</sup>這些站在右翼思考來立論的書籍,未必真正客觀地呈現佐藤個人思想,泰半不過是以己度人,以訛傳訛。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內,並非沒有反擊聲浪,惟更多純屬無稽之談,<sup>95</sup>實無檢討必要。

倘使回顧佐藤一生的行為和言論,也許讀者就不會感到那麼 唐突和意外。他在戰前偶遇中日外交上「排日」風潮,並未以民 族國家的立場看待事情,也不全然替日本說話,所關懷處仍係人 類普世的價值。直到滿洲國崩解前,佐藤依舊思考怎樣弭平戰禍 帶來國家和族群間的裂痕。戰後他憶及自己過往時,有段文字可 說發人深省:

雖然滿洲國已滅亡,但日本人和滿洲人在穿越死亡線之際的溫暖交流,依然永生不息。我是穿越民族的界線,以異民族的立場深信可披於更廣民族身上的。<sup>96</sup>

當今日思考二戰時各項政治、社會、經濟的斷裂或延續性時,佐藤慎一郎的這段話不妨可作為一註腳。

通過本文討論可知:佐藤慎一郎在戰後的諸多活動和言論, 隱約都能從戰前得到蛛絲馬跡,後來還反映至對東亞冷戰局勢的

<sup>93</sup> 櫻井よしこ,《日本の危機》(東京:新潮社,2000)。

<sup>94</sup> 鬼塚英昭,《田中角栄こそが対中売国者である:〈佐藤慎一郎・総理秘密報告書〉を読み解く》(東京:成甲書房,2016)。

<sup>95</sup> 譬如天津社科院研究員指稱:「贈送字幅是中國文人社會中常見的示好行為,字幅內容多是對贈送對象的褒獎、期待等,有時也表示雙方的口頭承諾般的君子約定。像佐藤慎一郎的那種專家解釋,太脫離常識。自由記者櫻井よしこ這種書能夠在日本社會廣泛傳播,也是一個時代心理的反映吧。」參見周建高,《日本人善學性格分析》(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頁222。

<sup>96</sup> 佐藤慎一郎,〈中国人から見た日中友好と中国大陸の現状(四)〉,《師と友》,35:11(東京,1983.11),頁20-25。

看法中。他的思想有其延續性,要理解其人應當留意長時段縱向的意義,而非任意割裂或斷然摘取其觀點,以符一己之意。儘管其觀察不見得完全正確,可是我們思忖佐藤心態和言論時,不妨體認其中時空帶來的變化。好比近人檢討滿洲國時代官僚體制如何在戰後東亞的延續一樣,至少在重新理解冷戰二元論及威權主義興起的課題上,<sup>97</sup>可謂提供了一扇窗口。佐藤慎一郎其「跨境的歷史認識」,無疑正是貫穿滿洲國時代到戰後的見證。

(責任編輯:林煒恩 校對:韋彥廷)

<sup>&</sup>lt;sup>97</sup> Rolf I. Siverson, "From Chimera's Womb: The Manchukuo Bureaucracy and Its Legacy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7: 1 (January, 2020), pp. 39-55.

## 引用書目

#### 一、文獻史料

## (一)檔案

〈第4682号 11·10·5「満洲国吉林省長一行見学の件」(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昭和11年10月(1936.10),收入《海軍省公文備考》,東京: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蔵,檔號:C05034820900。

#### (二) 史料彙編、人名錄及其他

- 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偽滿傀儡政權》,北京:中華書局,1994。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日偽政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 大同學院同窓會本部編,《滿洲帝國大同學院同窓會名簿》,新京:編者 印行,1941。

中西利八編,《第三版滿洲紳士錄》,東京:滿蒙資料協會,1940。

中西利八編,《第四版滿洲紳士錄》,東京:滿蒙資料協會,1943。

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傳》,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4。

舉國社編,《大滿洲帝國名鑑》,出版地不詳:編者印行,1934。

(三)雜誌、報紙、公報

《滿洲國政府公報》,新京,1932。

《大公報》,上海,1947。

《大公報》,香港,1948。

《聯合報》,臺北,1971-1972、1977。

- 井上實,〈農本建設の起點 模範村の經營につき〉,《大亜細亜》,3: 3,東京,1935.3,頁2-9。
- 佐藤慎一郎, 〈體育講習〉, 《南滿教育》, 121, 旅順, 1932.11, 頁 45。
- 佐藤慎一郎,〈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槪況〉,《民政部調査月報》,1: 7,新京,1936.7,頁83-98。
- 佐藤慎一郎、〈支那に於ける縣政建設實驗區設立關係規程〉、《民政部

調査月報》,1:8,新京,1936.8,頁101-114。

- 佐藤慎一郎,〈支那農村に於ける經濟的剝奪關係〉,《民政部調査月報》,2:1,新京,1937.1,頁1-22。
- 佐藤慎一郎,〈定縣に於ける縣政建設運動(前)〉,《民政部調査月報》,2:3,新京,1937.3,頁47-70。
- 佐藤慎一郎,〈山東鄒平實驗縣實驗規程集〉,《内務資料月報》,1: 1,新京,1937.7,頁31-38。
- 佐藤慎一郎,〈山東鄒平實驗縣實驗規程集(二)〉,《内務資料月報》,1:2,新京,1937.8,頁61-81。
- 佐藤慎一郎,〈山東鄒平實驗縣實驗規程集(三)〉,《内務資料月報》,1:3,新京,1937.9,頁46-66。
- 賀揚靈著,佐藤慎一郎譯,〈察哈爾·綏遠蒙民經濟の解剖(其の 九)〉,《内務資料月報》,2:10,新京,1938.10,頁17-44。

### 二、近人專書

- 江南,《香港記行》,臺中:臺灣日報社,1966。
- 余敏玲,《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 周建高,《日本人善學性格分析》,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7。
- 周愛靈著,羅美嫻譯,《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
- 姚崧齡,《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
- 唐柱國,《燕京舊語》,臺北:雙十字出版社,1966。
- 麥志坤著,林立偉譯,《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 1949-1957》,香港:中華 書局,2018。
- 陳湛頤、楊詠賢編,《香港日本關係年表》,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2004。
- 國際歷史學會議日本國內委員會編,宮長為、趙德生、高樂才譯,《戰後日本的中國現代史研究綜述》,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1988。
- 黄自進,《「和平憲法」下的日本重建(1945-1960)》,臺北:中央研究

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9。

賀揚靈,《察綏蒙民經濟的解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鄺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5。

嚴紹盪,《日本的中國學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ローベル・ギラン著,井上勇譯,《六億の蟻:私の中国旅行記》,東京:文芸春秋新社,1957。

中村義等編,《近代日中関係史人名辞典》,東京:東京堂出版,2010。

加藤豊隆,《小說 大観園》,松山:愛媛通信社,1974。

伊藤隆、季武嘉也編,《近現代日本人物史料情報辞典 4》,東京:吉川 弘文館,2011。

村上保男、《日本農政学の系譜》、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2。

对外関係史総合年表編集委員会編,《対外関係史総合年表》,東京:吉 川弘文館,1999。

佐藤慎一郎,《滿洲及滿洲人》,新京:滿洲事情案內所,1940。

佐藤慎一郎,《新中国の命運をかけた人民公社》,東京:鋼書房, 1959。

佐藤慎一郎,《中国共産党の農業集団化政策》,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 所,1961。

佐藤慎一郎,《農業生産合作社の組織構造》,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 所,1963。

佐藤慎一郎,《人民公社の組織構造》,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1964。

佐藤慎一郎,《汨羅の淵に佇んで中国の激動史を見る一中華人民共和国 誕生の陣痛一》,堺市:大湊書房,1985。

林金莖,《戦後の日華関係と国際法》,東京:有斐閣,1987。

星野直樹,《見果てぬ夢-満州国外史-》,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 1963。

武井義和,《孫文を支えた日本人 山田良政・純三郎兄弟》,名古屋: あるむ,2011。

- 岡田よし子、《父・井上忠也を偲ぶ》、出版地不詳:作者刊行、2004。
- 金田進編,《鳥取県百傑伝:近代百年》,鳥取:山陰評論社,1970。
- 厚生省研究所人口民族部編,《漢民族の社會病理學的實態調查參考資料:滿洲國哈爾濱傅家甸》,出版地不詳:編者印行,1943。
- 栗田尚弥,《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日中を架けんとした男たち》,東京: 新人物往来社,1993。
- 姬宮栄一,《香港:その現状と案内》,東京:中央公論社,1964。
- 鬼塚英昭,《田中角栄こそが対中売国者である:〈佐藤慎一郎・総理秘 密報告書〉を読み解く》,東京:成甲書房,2016。
- 湯/恵正行編,佐藤慎一郎著,《中国人から見た中国の現状―中国人の物の考え方―》,大阪:新教育懇話会,1973。
- 貴志俊彦、松重充浩、松村史紀編,《二○世紀満洲歴史事典》,東京: 吉川弘文館,2012。
- 満洲国警務総局保安局編,《魔窟·大観園の解剖》,東京:原書房, 1982。
- 霞山会編,《霞山会50年史》,東京:編者印行,1998。
- 櫻井よしこ,《日本の危機》,東京:新潮社,2000。
- Chang, Jing Jing. Screening Communities: Negotiating Narratives of Empire, N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Hong Kong Cinem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 Chou, Grace Ai-Ling.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at Hong Kong's New Asia College, 1949-63.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1.
- Erdmann, Karl Dietrich. 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gres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898-2000.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5.
- Guillain, Robert. Six cents millions de Chinois sous le drapeau rouge. Paris: Julliard. 1956.
- Haddow, Robert. Pavilions of Plenty: Exhibiting American Culture Abroad in

- the 1950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7.
- Hixson, Walter L. Parting the Curtain: Propaganda,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1945-196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 Lee, Sangjoon. Cinem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US Diplom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sian Cinema Network.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0.
- McCormack, Gavan. *Client State: Japan in the American Embra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7.
- Robin, Ron. The Making of the Cold War En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Military-Intellectual Complex.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Saunders, Frances Stonor.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London: Granta Books, 1999.
- Wilson, Sandra. *The Manchurian Crisis and Japanese Society, 1931-3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Young, Louise.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三、近人論文

- 王汎森,〈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收入 王汎森等,《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007,頁171-200。
- 王梅香,〈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的東南亞文化宣傳(1951-1959)〉,《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32:1,臺北,2020.3,頁123-158。
- 白玉平、曲鐵華,〈冷戰時期(1945-1975)美國基金會對日本教育援助項目探析——兼論戰後日本教育發展歷程中的美國因素〉,《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4,長春,2017.7,頁196-203。
- 朱維理,〈香港的「中國」歷史意識:1960年代以來初中中國歷史教科書 與社會論述的轉變〉,《思想》,31,臺北,2016.9,頁97-131。
- 朱維理,〈1960年代以來香港初中中國歷史及歷史課本與二戰歷史記

- 憶〉,《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55:2,臺北,2017.6,頁 123-185。
- 村田雄二郎訪問,紀曉晶譯,〈野村浩一訪談錄〉,《國際漢學》, 2010:2,北京,2010.11,頁28-47。
- 杜贊奇著,趙洪瑋、韓威譯,〈1941-1966年香港與東亞新帝國主義〉, 《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青島,2008.7,頁 22-30。
- 周一良, 〈扶桑四周〉, 收入周一良, 《周一良集 第 4 卷:日本史與中外 文化交流史》,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401-423。
- 林志宏,〈地方分權與「自治」——滿洲國的建立及日本支配〉,收入黃 自進、潘光哲主編,《近代中日關係史新論》,新北:稻鄉出版社, 2017,頁 643-683。
- 林志宏,〈冷戦体制下における大同学院同窓会——日本と台湾の場合〉,收入佐藤量、菅野智博、湯川真樹江編,《戦後日本の満洲記憶》,東京:東方書店,2020,頁254-258。
- 林志宏,〈重建合法性——滿洲國的地方調查、模範村及其「教化」〉,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17,臺北,2022.9,頁83-122。
- 林果顯,〈1950年代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談判〉,《國史館館刊》, 71,臺北,2022.3,頁135-182。
- 林啟彥,〈戰後香港地區的中國近代史教研成果〉,收入香港中國近代史 學會編,《中國近代史研究新趨勢》,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5,頁11-36。
- 馬場公彥,〈「文化大革命」在日本(1966-1972):中國革命對日本的衝擊和影響〉,《開放時代》,2009:7,廣州,2009.7,頁50-69。
- 馬場毅、黃英哲,〈介紹日本愛知大學所藏中國近代史關係資料一霞山文庫與山田良政:純三郎檔案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6,臺北,1998.9,頁139-143。
- 崇潤之,〈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對香港的文化統制〉,蘇州:蘇州科技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2018。
- 張屹、徐家林,〈異域之眼:日本的中共黨史研究〉,《黨史研究與教

- 學》,2021:2,福州,2021.4,頁84-95。
- 張雅晶,〈「文化大革命」時期日本人的文革論〉,《史學月刊》, 2001:3,開封,2001.6,頁78-86。
- 許瑛,〈1945年-1972年日本學術界對中國革命的研究〉,《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2,瀋陽,2008.3,頁25-29。
- 曾香屏,〈日本統治下的香港一以日本文化的移植為中心一〉,臺北:淡 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
- 黃克武,〈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1949-1953)〉,《二十一世 紀》,162,香港,2017.8,頁47-63。
- 楊子震,〈中國駐日代表團之研究——初探戰後中日·臺日關係之二元架構〉,《國史館館刊》,19,臺北,2009.3,頁47-86。
- 翟韜,〈冷戰語境下的新「華夷之辨」——美國對華宣傳與兩岸政權形象的塑造〉,《史學月刊》,2016:2,開封,2016.2,頁93-105。
- 齊鵬飛,〈「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49 年至 1978 年新中國對於香港問題和香港的特殊政策〉,《中共黨史研究》,1997:2,北京,1997.5,頁23-30。
- 劉維開,〈淪陷期間中國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活動〉,收入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0,頁477-499。
- 劉曉鵬,〈敵前養士:「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前傳,1937-197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2,臺北,2013.12,頁145-174。
- リン ヒュング (Hyung Gu Lynn), 〈政治と知識:東洋協会の情報・政治構想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Toyo Kyokai's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Projects)〉,《拓殖大学百年史研究》,1、2 合併号,東京,1999.3,頁1-32。
- 小野信爾,〈A·F 資金問題と中国学術代表団招請運動——懐柔と分裂の 策動への反攻〉,《歴史評論》,159,東京,1963.11,頁14-23。
- 山田純三郎,〈50年の大陸生活〉,《世界の動き》,4:3,東京, 1949.2,頁6-7。
- 今泉潤太郎、藤田佳久、〈孫文、山田良政・純三郎関係資料につい

- て〉,《愛知大学国際問題研究所紀要》,97,名古屋,1992.9,頁 413-513。
- 不著撰人,〈最近の中共事情きく〉,《大同学院同窓会報》,27,東京,1966.6,頁5。
- 不著撰人, 〈佐藤慎一郎先生関係年譜(未定稿)〉, 收入長塩守旦監修, 《日中提携してアジアを興す 第2集 我が生涯は水の如くに》, 東京: 志学会, 2001, 頁9-12。
- 安藤彦太郎,〈戦時期日本の中国研究〉,收入小島晋治、大里浩秋、並 木頼寿編,《20世紀の中国研究:その遺産をどう生かすか》,東 京:研文出版,2001,頁156-173。
- 個隆一郎,〈山田純三郎と「中国新軍閥混戦」—孫文死後数年間の山田の軌跡—〉,《オープン・リサーチ・センター年報》,3,豊橋,2009.3,頁367-377。
- 佐藤慎一郎,〈中共における思想改造運動〉,《アジア問題》,8,東京,1953.9,頁30-39。
- 佐藤慎一郎, 〈明暗二つの台灣〉, 收入防衛廳防衛研修所編, 《研修資料(第3集)》,東京:防衛研修所,1954,頁217-226。
- 佐藤慎一郎, 〈中国共産党の社会統制力の実相〉, 《アジア問題》, 3: 2, 東京, 1955.8, 頁72-81。
- 佐藤慎一郎,〈中国の高等教育と知識階級の諸問題〉,《アジア問題》,8:2,東京,1958.2,頁78-88。
- 佐藤慎一郎,〈中国における経済建設の諸問題〉,收入アジア経済研究 所編,《中国における経済建設の諸問題》,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 所,1961,頁92-112。
- 佐藤慎一郎,〈中国大陸における農業の実態とその影響(上)〉,《師 と友》,14:1,東京,1962.1,頁19-23。
- 佐藤慎一郎,〈中国大陸における農業の現状と将来(下)〉,《師と 友》,14:2,東京,1962.2,頁19-23。
- 佐藤慎一郎,〈中国の民族問題と中共政策の根本矛盾〉,收入時事問題 研究所編,《中共をどうみるか》,東京:時事問題研究所,1964,

頁 94-106。

- 佐藤慎一郎,〈人民公社〉,收入アジア政経学会編,《中国政治経済綜覧 昭和41年版》,東京:民主主義研究会,1966,第四編第二章, 頁353-362。
- 佐藤慎一郎,〈雲外の天は常に青天なり〉,《海外事情》,17:12,東京,1969.12,頁49-56。
- 佐藤慎一郎, 〈中国民族の幻想——人民公社〉, 《月刊世界政経》, 1: 2, 東京, 1972.4, 頁 24-32。
- 佐藤慎一郎, 〈中国人の心〉, 《海外事情》, 21:2, 東京, 1973.2, 頁 19-26。
- 佐藤慎一郎、〈昆明連区政治部(秘)資料——中国はどのような意図の もとにニクソンや田中首相を招いたのか?・昆明軍区政治部宣伝部 が、所属部隊の参考教材として編集した「教育大綱」が語る毛沢東 革命外交路線の実態〉、《諸君!日本を元気にするオピニオン雑 誌》、7:10、東京、1975.10、頁176-193。
- 佐藤慎一郎,〈中国から見た日中条約〉,《師と友》,31:1,東京, 1979.1,頁23-29。
- 佐藤慎一郎,〈日中交流私考〉,《海外事情》,27:4,東京,1979.4, 頁47-54。
- 佐藤慎一郎,〈鄧小平時代の到来〉,《月刊カレント》,18:5,東京,1981.5,頁4-11。
- 佐藤慎一郎,〈中国人から見た日中友好と中国大陸の現状(二)〉, 《師と友》,35:9,東京,1983.9,頁19-24。
- 佐藤慎一郎,〈中国人から見た日中友好と中国大陸の現状(四)〉, 《師と友》,35:11,東京,1983.11,頁20-25。
- 佐藤慎一郎,〈どたん場における人間学一敗戦・亡国・獄中記一〉,收入佐藤慎一郎著,《佐藤慎一郎選集》,東京:佐藤慎一郎選集刊行会,1994,頁167-308。
- 武井義和,〈孫文支援者であった山田純三郎の戦前から戦後における日 中関係観とアジア観一孫文死後の山田の主な発言と行動を手掛かり

- として一〉,《同文書院記念報》,27,豊橋,2019.3,頁17-32。
- 長谷川雄一,〈「満州国」創建期における政軍関係—関東軍の政治的役割一〉,《亜細亜法学》,18:2,東京,1984.5,頁143-168。
- 長谷部茂, 〈東洋学教授·佐藤慎一郎の人と学問:新生中国・中共に対峙した拓殖大学地域研究の学統〉, 《海外事情》,69:4,東京,2021.7,頁71-83。
- 奧村弘,〈「満州国」街村制に関する基礎的考察〉,《人文学報》, 66,京都,1990.3,頁15-39。
- 萩野脩二,〈「支那通」について〉,《中国研究月報》,554,東京, 1994.4,頁32-40。
- 瀬川五郎等,〈訪韓・訪台で感じたことども〉,《大同学院同窓会報》,41,東京,1970.1,頁4-6。
- 藤岡真樹,〈冷戦初期のアメリカ合衆国の大学におけるソ連研究の諸相:ハーヴァード大学難民聞き取り計画と学知の「停滞」〉,《史林》,99:3,京都,2016.5,頁419-456。
- Duara, Prasenjit. "Hong Kong as a Global Frontier: Interface of China, Asia, and the World." In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edited by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pp. 211-23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 Hopkins, Michael F. "Continuing Debate and New Approaches in Cold War Histor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50: 4 (December, 2007), pp. 913-934.
- Johnston, Gordon. "Revisiting the cultural Cold War." *Social History*, 35: 3 (August, 2010), pp. 290-307.
- Kit-ching, Chan Lau.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in Hong Kong, 1921-1934." *The China Quarterly*, 164 (December, 2000), pp. 1044-1061.
- Madokoro, Laura. "Surveying Hong Kong in the 1950s: Western Humanitarians and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Modern Asian Studies*, 49: 2 (March, 2015), pp. 493-524.
- Peterson, Glen. "Crisis and Opportunity: The Work of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CI)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In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edited by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pp. 141-159.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Siverson, Rolf I. "From Chimera's Womb: The Manchukuo Bureaucracy and Its Legacy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7: 1 (January, 2020), pp. 39-55.

# Observations on China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On the Writings of Sato Shinichiro

## Lin, Chih-hu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writings on China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by the late Shinichiro Sato (佐藤慎一郎; 1905-1999). His works are of great interest to historians in large part because of his unique experiences. Prior to and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Sato served, in turn, as an official of the Manchurian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an instructor at the Tatung Academy, and a counselor of the Department of General Affairs. He left Manchuria and returned to Japan in 1947, following Japan's surrender at the end of the war. In 1959, after assuming a teaching position at Takushoku University, Sato began writing a series of essays known as the CCP Observations. The old China hand had now become a staunch anti-communist. Beginning in 1967, in his role as professor of Takushoku University, Sato visited Hong Kong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where he interviewed refugees from mainland China. When the Joint Communique of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signed on September 1972, Sato was openly critical of the pro-communist stance of the Tanaka cabinet in Japan.

I argue in this paper that to understand Sato's works written at the height of the Cold War, including his critique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efforts and its people's communes, we must also look at his writings from prior to the Cold War, for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continuity in his thought. He was sharply critical of traditional China, and his criticisms of Cold War China were an extension of his former views. According to Sa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as embodied in Taiwan after the Kuomintang (KMT) government relocated to the island; hence, he was critical of aspects of Taiwan as well.

**Keywords:** Hong Kong, Japan,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s after World War II, Cultural Cold War, Shinichiro Sato